

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斯图亚特·霍尔访谈

雷纳·温特 (Rainer Winter)

蔡嘉慕·阿齐佐夫 (Zeigam Azizov)

李 开 译 陶东风 校*

摘要 斯图亚特·霍尔谈到英国文化研究在形成初期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大众文化的重要作用 and 葛兰西传统意义上的介入思想，回应了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误读，分析了艺术、流散与移民之间的联系，指出了关于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的讨论所存在的误区和问题。

关键词 文化研究 大众 理论 介入 全球化

Abstract Stuart Hall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ith sociology in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in Birmingham,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pular culture, discusses the idea of intervention in the tradition of Gramsci, responds to the misreading of Cultural Studies, analys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rt, diaspora and migr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miscon-

* 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1932 - 2014), 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代表著作主要包括《通过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1976)、《控制危机: 行凶抢劫、国家、法律和秩序》(1978)、《艰难的复兴之路: 撒切尔主义和左派危机》(1988)。雷纳·温特 (Rainer Winter), 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媒介与传播科学学院教授, 德语世界媒介与文化理论领军人物, 在中国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 著述丰硕, 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固执的艺术: 作为权力批判的文化研究》(2001)、《网络上的抵抗》(2010) 以及《文化研究的未来》(2011)。蔡嘉慕·阿齐佐夫 (Zeigam Azizov), 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媒介与传播科学学院, 艺术家、散文家、哲学家。李开,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斯图亚特·霍尔的情势分析理论与实践研究”(Y201839275) 的阶段性成果。

cep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discussions about moderniza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the popular theory intervention globalization

访谈背景介绍

我们的访谈是在斯图亚特·霍尔夫妇的家里进行的。那是 2008 年 1 月 21 日早上,我既激动又充满期待。20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化研究以及霍尔思想的研究。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固执的艺术:作为权力批评的文化研究》(2001)重建了文化研究自其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以来的发展史,分析了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也特别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作为社会学家,对我和我的研究来说,最有意义的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特别是文化社会学。

我与蔡嘉慕·阿齐佐夫 (Zeigam Azizov)、伊丽莎白·内德尔 (Elisabeth Niederer) 一起去拜访霍尔。蔡嘉慕·阿齐佐夫是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艺术家和文化理论家,他已在伦敦居住多年。伊丽莎白·内德尔是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她正在克拉根富特大学做关于贫穷文化的博士论文。那天下午特别令人难忘,我们觉得特别有收获,特别兴奋。在霍尔家的客厅里,霍尔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们泡茶,提供点心。与我之前遇到的一些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不同,尽管霍尔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却是一位特别谦虚、特别能理解别人的人。他对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感兴趣,很想了解更多。在这样融洽的氛围中,对话和互动就特别舒服。这样的谈话特别难得,我们心底希望能够永远进行下去。

蔡嘉慕·阿齐佐夫整理了这个访谈稿,但它只是我们那天下午谈话的一部分。斯图亚特本想对文稿进行修改,不幸的是,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这次访谈能够发表。斯图亚特在去世前不久同意并鼓励我们发表这个访谈。非常感谢您,斯图亚特!

雷纳·温特
沃尔特湖克拉根富特市
2017 年 7 月

一 文化研究的形成

雷纳·温特（下文简称“温特”）：斯图亚特，首先，我想问你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对于您本人的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形成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有多重要？在德国，批判理论的观念经常被等同于这个学派的思想……

斯图亚特·霍尔（下文简称“霍尔”）：由于各种原因，法兰克福学派起初并不那么重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文本没有被翻译。而且很多人不会说德语。所以，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之初，我们并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文本。我们不了解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著作，也不知道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Adorno, T. W. et al, 1950）是一本很好的书，但这本书不是阿多诺的经典文本。后来，我们读过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但那是他在加利福尼亚时期的作品。我们说的是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我们并没有太多涉及哲学。我们有从事历史学、图像艺术理论、语文学研究的人员，但没有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员。我们也思考过英国语言哲学的状况，但不喜欢欧陆的形而上学。读德国的形而上学，比如海德格尔，就会在哲学的迷雾中走失。我们没有读太多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哲学，比如，J. L. 奥斯丁（J. L. Austin）。后来，我们对他们都产生了兴趣。这就是早期的文化研究没有成为一个哲学领域的原因。你应该对此不会感到惊讶。当我们进入政治问题之时，我们通过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其对黑格尔的批判才与哲学相遇。他对某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特别深刻。后来，我们才得到他的一些书。当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之后，我们才明白，文化研究是一项多么严肃的工程。这是历史中失去的瞬间（moment）。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很多，包括德国社会学，曼海姆、韦伯，但在哲学方面就不是这样。这确实是早期文化研究的弱点，但也有优点：可以帮助逃离理论的空谈。

雷纳：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文本看，如《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显然，德国文化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起初备受关注。

霍尔：是的。韦伯特别重要。我们这样看待他的著作：我们把韦伯、

涂尔干、马克思一起视为现代社会学的三部曲。涂尔干和韦伯被纳入社会学的方式十分特别。在文化研究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是在对社会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面对社会学。我们读过涂尔干的方法论著作，韦伯的著作和书信，但是，我们没有接受传统的马克斯·韦伯。我们也没有因循守旧地解读韦伯，我们对涂尔干的解读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批判地解读了《自杀论》(1897) (Durkheim, 1951)，但是，激起我们兴趣的是它的政治偏向。因为我们没有接受社会学训练，所以我们无法用其他方式解读。我们唯一所用的社会学是美国的阐释传统，但是我们也对欧洲关于劳动的社会学感兴趣，而且欧洲社会学本身哲学味十足。另一方面，我们对韦伯感兴趣，因为他鼓励我们批评现有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理解韦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的理解是，韦伯特别关注与资本主义历史有关的问题，这与马克思的基本关切多有重合之处，而且韦伯还开启了很多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读、所教的文本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Weber, 1930)。这本书写道：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变革当然存在，但问题是，早期资本主义是如何占有人民的主体性的。所以，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文化问题。而且他关于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作用的分析十分有见地。当然，我们借鉴韦伯的方式不止这些，我们借鉴韦伯的观点但不是成为韦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摘取所阅读、借鉴、汇编的一切东西为我所用。有些取自社会学，有些不是；有些取自理论，有些不是，“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概念并不纯粹。

从概念上讲文化研究一直都很弱。我的研究非常折中，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从来不是韦伯式的，从来不是葛兰西式的，也从来不是阿尔都塞式的。在《读资本论》(1965) (Althusser, 1970) 中，阿尔都塞指出“理论是完全自治的。”有一种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葛兰西，我并不认为他关于葛兰西的所有说法都正确。但是，我明白，我与这些人都有紧密关联，从他们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例如，从葛兰西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也拒绝一些东西。最明显的是我借用马克思的方式：我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后来才进入其他领域。人们说，你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了。这并不对，因为我从来都不是经济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不是经济还原论者。我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一些东西，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用于分析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就足够了。发

展这些大人物的理论的方式之一就是与之展开争论，从中借鉴有用的东西。在这一阶段，文化研究中心也是这样做的。

温特：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帕森斯社会学理论一直在社会学领域占据主导位置。我作为社会学家，从您对他的批判中深受启发。您呈现出不必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也可进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霍尔：是的。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很像结构功能主义，在英国社会学中非常流行，战后取代美国社会学成为主流的社会学理论。英国社会学发展迅速。在英国，学者们跟随美国而不是欧洲的社会学发展趋势。所以帕森斯特别重要。他确实赋予文化很重要的地位。他说有三种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性格系统，尽管他没说文化是什么。他说在社会系统中有一种工作，特别是在涂尔干的著作中，你需要读《自杀论》（1897）（Durkheim, 1951）和《社会学方法规则》（1895）（Durkheim, 1964），但是，不要在意他关于唯心主义文化观的东西。那么，他所说的东西中没有我们感兴趣的東西。我感兴趣的是象征符号，以及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相关论述。例如，对我来说，列维-施特劳斯以及他对此类社会现象的解读很有意思，但是帕森斯处在另外一边。我必须去看帕森斯的理论，是因为英国社会学在走向结构功能主义，而不是阿尔都塞的文化路线。

温特：还有其他两种不属于主流的社会学路线，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构成至关重要：阐释社会学和查尔斯·莱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研究。

霍尔：我深受米尔斯影响。我跟他很熟，在新左派时期，他经常来英国，随后他去了古巴。1962 年他写过一本关于古巴的书。他也是拉尔夫·米利班德（Ralf Miliband）[现任外事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的父亲]的好友，拉尔夫是一位好战分子。米尔斯是他很亲密的朋友。他骑着摩托车去过苏联。他写过一本书，书名是《白领》（1951），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重要，这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一本书。我对他写的另一本书《权力精英》（1956）也很感兴趣。这是在文化研究中心之前的事情。在主体性、阐释学、社会互动论、符号互动论方面，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是美国社会学一种潜在的传统。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青年文化的所有研究工作，以及后来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符号互动论的产物。我们把它当作“次要的传统”（the subaltern tradition）。它并不声称能够揭示全部真理；它通过不同

的方法研究了符号意义问题、表征问题、主体性以及社会立场等问题。这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没有互动论传统,《通过仪式抵抗》(1976)以及后来的《控制危机》(1978)就无法完成。

温特:您已将互动论传统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知识社会学,尤其是彼特·L·伯格(Peter L. Berger)和汤姆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发挥什么作用?

霍尔:我们确实读过知识社会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知识社会学或许是更社会化或社会学化的看待文化和观念的方式。但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所吸纳的观点是,任何社会行动都以意义为媒介,并不是说人们真正意识到意义是什么,而是说,任何社会行动都要受到特定的文化观念的调节。马克思最早说过,任何建筑师的意义都超过最灵巧的蜜蜂,因为蜜蜂只是按照本能来建造,而建筑师根据计划来建造。建筑师头脑中的东西与其行动一致。社会行动既包含社会维度也包含符号维度,这就是问题的大部分内容。在这方面,美国意义上的符号互动论比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讲得更好。

二 解读大众

温特:能否请您谈谈大众文化在您研究中的角色?您写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对重新理解这个主题有重要贡献。您能告诉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您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何变化?

霍尔:嗯,我认为(大众文化)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众艺术》(1964),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和派迪·瓦内尔(Paddy Whannel)一起合写的。它源自地方大众文化,写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前。瓦内尔是英国电影学院的电影系教员。他过去是教电影的,比任何大学或学院更早开设有关电影的课程,我替他上过课。我们去过多部电影协会,这是唯一可以看到外国电影的地方。你在任何电影院都看不到。英国电影学院电影系开始设置系列课程。我教的课程是黑帮电影。抱歉,我太个人化了。我们经常探讨大众文化。每到周末,我们就听音乐,我听爵士乐,派迪听主流音乐,就在那时,我不仅知道了伯曼和黑泽明的重要性,而且也知道了约翰·福特(John Ford)的重要性。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位极其著名的电影导演,福特是在将西部电影塑造为一种大众风格。我们讨论过这一点,我

们也讨论过爵士乐，我们更争论过摇滚，那是摇滚爆炸的年代，但派迪一点也不能忍受它。我喜欢其中的一些，但并不多。所有这些争论引向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学校老师都对之产生兴趣。他们说，我们必须搞懂它，因为我们看电视、听音乐，但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大众艺术》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教学。如果你想了解西部电影，就看约翰·福特，如果你想了解流行音乐，就听流行音乐……所以，这属于伯明翰文化研究工程开始之前的那个时刻。而且，它受一个方面限制：那就是对批评不感兴趣。那时的兴趣在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很好听，其他歌手还可以，你知道，只是做出这样的区分就可以了。当然，现在，可以告诉这些教师更重要的东西，它们不仅仅是噪音。你们对阳春白雪的文学所做的研究，也可以用到这里。有好的西部电影，也有坏的西部电影。应该做出区分。这是很重要的评价工作。我认为，应该看看这些篇章是如何书写的。这或许被称为“原始的文化研究”（proto-cultural studies）。那是很早的事情。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大众文化研究工作的第二阶段是 《通过仪式抵抗》（1976）、迪克·赫比迪基（Dick Hebdige）的著作《亚文化》（1979）、媒介研究、肥皂剧研究，总之，对大众文化的兴趣浓厚。我认为，人们所感兴趣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人们认识到大众文化是高度商业化、高度技术化、高度市场化的文化工业。尽管如此，其中有一种共同的元素：大众的态度和情感并没有过度商业化。它和阿多诺所说的相反。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观认为，文化工业不但影响到所有人，而且生产了文化傻瓜，完全被外界塑造。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当然里面有情感。在肥皂剧背后的现代城市现实中，我们不再有任何可讲的故事。我每周去医院三次。在候诊室，病人们讨论《邻居们》或《加冕街》，但它们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其背后有很多情感元素。他们不懂心理分析，他们不懂心理学。他们没有激发理解的其他方式。唯一的理解方式就是讲述。第二阶段纯粹是受操纵地建构起来的，它已经进入了大众意识。如果某种东西流行起来，它所用的是什么感人的叙事？而且它不是仅由制片公司制造的叙事。

人们谈论的一种形式是快乐形式，是人们力图从有堕落的形式中努力发展出来的，从人们觉得感人的、严肃的、客观的质料中发展而来的，这就有点超出了文化工业。在此之外，认为所有制度都是堕落的，但这不是说人们只是空白屏幕，只按照工业所喜好的方式运转。你可以读到关于大

众意识变化的东西。不管是通过堕落的中介,还是通过消费主义的中介,你必须看到这点。对文化研究来说,此类批评很有意思。

好了,你问的是现在的状况(大笑)……我不了解现在的状况!我是说,我仍然对文化研究的上述方面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做文化研究的人对这方面根本不感兴趣。我不知道我能否胆敢这样说。我以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分析大众文化的美学维度。他们对简单的故事进行复杂的解构,非常复杂的符号学研究,这当然没问题!这是因为,在媒介中,即使是糟糕的艺术作品(art work)也被视为艺术品(artwork)。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令我不安的是,这其中的利益是什么,你不必回到我们之前谈过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操控性元素之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没有回到这些问题。第二,当代文化已经被高度技术化了。在我们以前讨论当代文化的时候,它还没有被如此技术化。商业电视在 20 世纪 50 年代来到英国,此后,形式的高度技术化、形式和意义的全球撒播就发生了。

温特:在谈论《大众艺术》(1964)以及成人教育的时候,您提到过文化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人教育是文化研究的开端之一。

霍尔: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 P. 汤普森和我都在成人班教过书。不是在正式场合下,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考证,只是在周五晚上上课。我去过几年,教过俄罗斯小说、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我说“不错!不错!这是我第五次听《米德尔马契》!”(大笑)……在某种自由的、非学术的情景下,谈论你的日常生活,意味着要调整你的概念、语言甚至你的整个教学方法。你谈论他们已知的东西。对我们几人来说,那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瞬间。而且,正如我在《大众艺术》中所说,它与大众形式也有关系。那么,它当然也是教学问题。它是关于如何教授未知领域的问题。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教学问题涉及什么,你就教什么。你在周一找到关于涂尔干的重要资料,到周五你如何教给学生?我们真的只是在不断设计、补充。我们年纪比较大,读的东西多一些,想法多一点,但是,很多教学材料不是读社会学或人类学就能得到的。我接受的是文学训练。我从未接受过正规的社会学训练。最后,我成为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温特:……而且您还曾经是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席(大笑)……

霍尔:有一个严肃的教学问题。未得到正常教学支持的情况下,如何

将研究环境设置成教学实践？学生们知道他们在和我们一起做。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写作。《控制危机》（1978）就是我与五位研究生合著的。迪克·赫伯迪格的成名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是他的硕士论文。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它的语境。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全是团队合作，每件事都是阅读小组共同完成，师生之间没有区别。那么，传统教学，课堂教学，算了吧！按照那种教学，完全不可能做到。你可以从我的话中感觉到，这是不可思议的经历，有点冒失。但这并不是传奇。再也不可能这样做！现在完全是不同的教学问题。

三 理论与介入

温特：在一些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如亨利·吉鲁（Henry Giroux）、皮特·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批判性的教学被视为一种介入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形式。我以为，批判性的教学和文化研究工程在这一点上紧密相关。介入的思想对伯明翰规划也很重要……

霍尔：是，绝对是！我们曾尽力找到将每一种概念发展视为介入的方法。必然是在理论领域的介入吗？不仅如此。它应该成为连接特定实践的纽带，连接在大学之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纽带，或者成为连接纯知识或纯学术之外的生活的纽带。你可以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发现这种教学观。他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在建造一面墙，你头脑中已经有了墙的模式。这是不同的教学计划。他们不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这是葛兰西所谓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功能”。人们如何思考社会关系？能否改变他们的理解？能否改变他们的相互理解？或者还有其他的东西？它是教学生在语境中学，它是这种意义上的介入。若将介入作为政治运动的指南，也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在意它的概念方面，倒不如直接参加政党或政治组织，或者介入阶级斗争。我一直坚持认为，理论反思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的视角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但你首先必须到达概念层面。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有共产主义者、劳工主义者、毛主义者，还有一些保守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一些批评工党的人。我坚持要求所有工作都要为作为一个团队的当代研究文化中心服务。否则，当代文化研究

中心就会走偏,或者走向托派,或者走向保守派,或者成为共产主义者,关键在于如何对其进行反思。它必须是一种反思。但是反思仍然是纯理论的。如葛兰西所说,它必须是具体的。不仅是特定的政治运动,而且还有特定的角色,比如他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我曾说过,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没有党派的有机知识分子(大笑)……像共产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组成为更广泛的政治架构,如何将这种党派扩大,并纳入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架构。不仅局限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就是我们创建期刊、不定期发表论文的原因,因为我们想把它们推出来,超出学生文化(student culture)限制之外。

温特:这使我想起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思想,为了改变自身的状况,获得解放,一个人是如何理解自身状况,尤其是理解权力关系的。

霍尔:是的!你知道,萨特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涉及存在主义。你看过萨特的《寻找方法》(1963)?我对萨特关于过去的说法很感兴趣:每一个瞬间都由过去构成。未来是去总体化(de-totalisation),也是再总体化(re-totalisation),历史是这样发展的:过去的构成与未来有关。这就是未来的构成方式。《寻找方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而且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使用去总体化和再总体化的语言。这是完全投入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前的萨特。在两个萨特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瞬间。

四 反对被指责为“文化民粹主义”

温特:我想问您怎么评价吉米·麦克圭根(Jim McGuigan)那本挑起争论的书《文化民粹主义》(1992)。我认为他的批判有些夸张,很不公平。文化研究的敌人喜欢它!

霍尔:是的,它对敌人非常重要,而且被没完没了地引用(大笑)……我想,我在谈论“大众”的概念时,已经说得够多了。所以,我认为他说文化研究有民粹主义取向是错误的。这与“大众”是什么以及葛兰西所谓的“大众”概念紧密相连。葛兰西说,有健全的理智(good sense),也有常识(common sense)。健全的理智是对常识的批判,常识十分混乱,但是他认为工人可能虽未觉察到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健全的理智。我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民粹主义的,

但我认为，有些研究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工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在赞颂大众。我以为，我自己对大众文化的兴趣并不是这样的。它介于大众文化的真实性与彻底的商业性之间。在我看来，麦克圭根并没有看出这些区别。

其中的第二个问题是，自起初以来，文化研究做了哪些事情？政治经济学又做了什么？经济学又怎样？首先，它是一个“编码”（code word）：马克思在哪里？哪个好问题？什么是政治的、功能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经济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思考，而那时我们并不仅仅对文化理论本身感兴趣。我们对文化及其与社会批判的关系感兴趣。我认为，人们并未意识到它与今天的实践有多么不同。我们处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它们（文化、经济、政治）三者是什么关系？这就是阿尔都塞为什么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原因：不是经济结构决定一切，而是把三种实践综合起来。我们没有在经济还原论的框架下思考经济问题。我对此仍然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文化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全球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嵌入文化？文化如何愈来愈依赖高度技术化的经济？在这三者（文化、经济、政治）的接合（articulation）中，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还原为另一种。不可以。如果你不能将其中之一还原为另一种，那你就必须考虑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这些瞬间的结果，的确是多元决定。这是早期文化研究的范式。这样，一旦你读阿尔都塞，你就会回想起这个等式：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他说过，即使是革命瞬间也具有某种透明度——即在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状况下，经济变化并未被悬置。在苏联和古巴，经济没有被悬置。我认为，没有还原论和特定的反映论，谈论经济的接合是非常困难的。你没法说，经济已经全球化了，所以意识形态也全球化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早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引发了威廉斯所谓的“文化与社会”问题。

关于接合与决定的复杂问题在某一点上发生了断裂，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不同的文化理论问题。文化理论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在这个瞬间，天知道经济在哪里！这个瞬间与如下高深理论的发展紧密有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等等。这些激进的高深理论的大爆发改变了我们的大脑。这是一个文化转向。但是，这个瞬间已经逝去。这是一个在文化框架内谈论经济的瞬间。当人们离开文化谈论经济的时候，他们无法理解它。就接合与文化而言，没有接合的文化演进是不

可能的。

这就是我此刻为什么不太喜欢文化研究的原因。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从全球化的角度谈论它的方式。文化如何超越这个范围?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们沿着这条线索, 但是现在我们处于绝对意义上的后理论状况。我并不是说, 从事理论研究不可能了, 而是说, 从一种理论生产出另一种理论已经不再可能了。文化与意义的理论关系密切。我认为, 客观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并没有将其意义镌刻在它们自己身上。桌子、图片并非自然存在之物。说一个对象并不存在, 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我只是创造了它, 但是依据文化系统, 我们必须通过与意义的关系与之互动。它无法超出对象世界, 因为它自身是由某种实践建构而成的。你无法从表征返回到参照物, 因为它并非像一片金属一样真实存在, 它不是这样。这不是返回到完全受限制的世界, 但是你不能说, 世界上没有参照物。在看《读资本论》(1970) 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这一点。在这本书中, 阿尔都塞问道: 我如何知道这种理论正确与否? 理论是没有保证的。我不相信文化中的简单的再现观——通过语言或符号的形式, 但我同样不相信文化就是最终的世界。它是被建构的。如同在比赛中一样, 当人们打球时, 他是在打板球还是踢足球? 这取决于人们打球时所用的不同动作, 它与将板球和足球区别开来的比赛规则有关。人们问, 话语在哪里? 它在其所在! 他们是追着真实的球跑动的真实的人。最终, 接合是由话语和意义所建构。这是对你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个很长的答案。为了理解经济, 你总要找到文化, 找到不同的东西。我常常称之为“第三条道路”, 但在该死的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之后, 我就不再这样称呼它!

五 艺术、流散与移民

温特: 在您最近的著作中, 艺术占据重要的位置。您能否解释一下, 您的研究方式为什么做出这么大改变? 当今艺术具有哪种功能?

霍尔: 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视觉艺术。我也写了一些东西, 但是大部分与政治有关。我写了一篇关于托尼·布莱尔的文章, 名为《新工党的双重洗牌》(2003), 深入讨论了此类特殊问题。但是我很少写别的东西。我在组建……我组建了国际艺术协会 (Iniva), 刚刚开放。我在两家视觉艺术组织任职: 国际艺术协会和签名黑人摄影师协会 (Autograph Association of

Black Photographers)，与年轻的艺术家们一起工作。今年，我已经退休十年。这些年来，我一直与视觉艺术对话。我对之知之甚少，但是我一直对图像、艺术都感兴趣，而且受过文学训练。但是我不是视觉艺术方面的专家。这种改变部分与我想在有生之年做些不同的事情有关，因为我觉得，大的理论时代已经结束，我想有所改变。退休之后，我想做些不同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欢艺术，是因为艺术关涉真实世界，真实世界无法直接通过经验理解。艺术源于真实经验，但又不同于真实经验，而以符号形式呈现。它与文化相似：为了使万事万物可以理解，文化必须远离经济。我认为这是艺术的原理。除此之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感兴趣的是艺术的多样性，因为我对身份、后殖民主义、黑人流散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感兴趣。我对视觉艺术的兴趣十分广泛。在视觉艺术方面，我所做的具体工作是拓展我早期关于流散、身份的研究，将自己带入另一个领域。我从中收获颇多。我关于身份的许多文章都认为身份不只是一种事物 (one thing)。在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中，我认为，我已经明确地扩大了身份的概念。也就是说，人不是永远固定的，而且他们的生活脚本也不是永远被其传统所书写。事实上，文化传统不是固定的，没有本质。人来自别处，他们受到不同的影响，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被解读，如同身份一样，文化不是稳定的。

在此语境下，我说：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根源 (roots)，而是路线 (routes)。与此同时，我通常还对自己的出身问题有兴趣：我所出身的加勒比海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非洲 (文化)？是不是非洲在新世界中所变化而成的 (文化)？我一直在思考。它是如何被当代全球进程所改变？非洲如何影响加勒比地区？加勒比如何受英国、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影响？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而是混杂 (hybridization) 的问题，是克里奥尔化 (creolisation) 的问题，等等。对我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现在！现在是后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伊拉克、后政治伊斯兰教！对许多人来说，身份似乎又固定下来了！我们又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我认为，我所说的没错，但是当下情势 (conjuncture) 将这些研究工作置于新的批判框架内。我总是说，在流散情况下，文化都可以选择，或者前进或者防卫性地退守，既免受种族主义之苦，也不会担负多种身份。

为了理解当下情势，尚需做很多研究。我对自 15 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

的抽象规律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工业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看，每一种情势的转变都在重来，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瞬间！

六 现代化与全球化

蔡嘉慕·阿齐佐夫：您刚才说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理论如何能像“工具箱”一样被使用，以新方式来理解一些旧概念。您已提及流散和多元文化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自己对移民范式的兴趣与之相似。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的处理方式非常不同，但自 9·11 以后，自俄罗斯富翁寡头移民伦敦之后，移民概念好像开始转变。移民者不再是穷人，而是千万富翁。我的问题与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撒切尔主义现象中所用的概念有关：逆向式现代化 (regressive modernization)。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它与我们现在的状况有何关系？

霍尔：用“逆向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我表达的意思是：撒切尔主义现象已被明显地纳入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极端变种，但同时在社会层面发生一种向威权主义立场倒退的运动。我认为，你不能仅以撒切尔处理社会民主终结、福利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将其简单地称为反动的人物。撒切尔所采取的唯一方式是向后退，退到亚当·斯密 (Adam Smith)，退到过去，使其在新语境下发挥作用。我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我说过，这是反对老右派的论战。她无法容忍老右派，同时她又喜欢传统仪式。在入侵福克兰岛的时候，她喜欢派遣海军旧部去作战。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倒退和前进的矛盾组合。但是，在历史上多见吗？我不知道这种维度是什么：以传统价值观之名跳出现有框架向后退。没有其他种类的价值观。但是又不能靠直接革命完成。这就是撒切尔主义时代的有趣之处。

我还没有想过它现在是什么，真的。现在我们在另一个逆向式现代化的瞬间。我在思考撒切尔主义时，我大部分是根据英国民族政治对之进行界定。它是英国政治新情势的开端，这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它是福利国家的终结。但是若没有找到新资源，譬如全球化生产、全球消费、全球投资、全球军事地缘政治，福利国家也不可能终结。这个瞬间就是开端，我们知道，里根和撒切尔共同开启了一种新情势。我现在从更加广泛的全球

化语境下解读撒切尔主义，与之前稍有不同。我对全球化问题十分关注。

阿齐佐夫：您能否谈一下关于全球化的新关注点？

霍尔：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机制已基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组。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世界市场。不论市场的社会组织形式终端为何，它都是资本市场的开端。在获得所在地方准许之前，你就可以在拉丁美洲、在中国进行贸易。这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瞬间。当代资本主义的演进必定走向全球化情势。它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现在正在其中间。所以，我说，文化研究需要自我反思，因为在新的治理情势下，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功能。

全球化的第二个方面由两个瞬间构成。其一是我所谓源自上层的全球化，其二是源自下层的全球化。源自上层的全球化是指目前的国民生产，比如，莫桑比克或中国的工人每天工作只为了挣一美元。人们问，英国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已经走向全球！这种制度现在已跨越无限空间，接合而成时空压缩！时间和空间的凝缩完全是一种新瞬间。这就是源自上层的全球化。源自上层的全球化的文化意义就是现代化。每个人都成为现代商品市场的一部分，信息应该传播到任何角落，每个人迟早都要放松，穿牛仔裤，运动鞋，每个人都应当去街角的麦当劳，全世界的食物都被麦当劳化。大体上讲，全球化还有其文化功能。当布什说，你和我们一样行走，和我们一样做爱，和我们一样做梦，梦见我们，梦见曼哈顿！我想，这是现代化。

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总会发生，因为在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里，中心不止一个。同时，令人震惊的是，为了增加经济机会，人们被迫背井离乡，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例如，他们通过媒体得知其他地方的机会，他们就说“我为什么要呆在这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加利福尼亚。”所以，人们一直在流动；有的将自己置于人贩子之手，有的加入性产业。这类全球流动的人口就是迈克·哈特（Michael Hardt）和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在《帝国》（2000）中的乌合之众、难民、移民、居住在临时营地里的人，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临时营地，哪里也去不了。这种人口流动就是源自下层的全球化。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我所谓的“本土现代性”（vernacular modernity）。它受到的限制更多，来源有限，只能实现并使之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但也必须与之保持距离。这是全球化的另一番景象。在关注多元文化主义、流散、身份等问题时，我思考这些事情的出发点就是本土现代性，

而不是均质化 (homogenization)。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系统,根本没有一个全球,根本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这个矛盾系统的运作平台,但是它在阿富汗、巴西、印度或纽约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马克思称之为不平衡发展。

温特: 人们也对“别样现代性” (alternative modernity) 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讨论过用不同方式变成现代的可能性,十分令人振奋。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Larry Grossberg) 刚写过这方面的东西。

霍尔: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实际上,没有人想按照老样子生活,人人都想要一块现代性。在理想的世界里,你原本能够得到印度版的现代性,中国版的现代性,我们确实有这些。它们被压缩成霸权系统的一部分。这种运动结果真的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现代化是终结,我不认为它是成功的,我不认为它将构成霸权,“现代的” (the modern) 不同版本不断地自我彰显。非洲变成现代的方式与中国变成现代的方式不一样,我想,这就是它应该如此而已,但是这些形态将受到侵略、征服、中立化等方面的考验。朝这方面发展是极其可怕的趋势。

温特: 目前知识界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世界主义以及其在跨民族的、21 世纪的世界中的作用。例如,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的说法是“世界主义的社会” (cosmopolitan vision of society), 而且他提出过不同的概念,主张一种“生根的世界主义” (rooted cosmopolitanism)。

霍尔: 若你所说的世界主义是世界文明、世界和平、康德式命令 (Kantian imperative), 那么,我就不太相信它。我认为,世界并没有向某种世俗版本的制度演进。我认为,(造成) 差异部分是历史原因,部分是发展原因,部分是语言原因,部分是文化原因,部分是政治原因,部分是经济原因。即使是在一个星球运行之内,事物之间彼此相连,但它们仍然彼此不同。差异是真实持久地存在着的。并不一定永远存在,但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多元文化主义之中发现差异、找出可协商的差异,或者在政治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福音派中找出原教旨主义的差异! 但是我认为你无法清除这些差异。在这种意义上,乌托邦式世界主义的概念就不是对差异问题的介入。这不是去说服美国或英国,在一国之内(如阿富汗)任何易于识别的事物都有其传统和宗法。西方政治体制将持续存在下去。但是,你的意思是,全球化已经造成了每个地方对每个其他地方的觉察意识。在民族这个箱子内,你无法再创造任何现代生活,大家都彼此了解。我想,这就是我所谓

“本土世界主义”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这就是所谓的接受差异。我相信这种世界主义。源自上层的世界主义,大部分根源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能力,也是资本主义的后果,当人们在不同的大洲都拥有房产,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和与其处于同样位置的人所做的一模一样,他们不会说外语,因为人人都说英语!我认为这种世界主义不会奏效!它只是全球文化的新霸权。而且我认为,赋予其一个乌托邦式的名字就是让我们忘掉世界上不断增加的不平等。

温特: 与之紧密有关的一个概念是跨民族的市民社会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它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全球民主领域。不受限制的市场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受到批判和挑战。有各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有各种形式的全球抵抗。它明显是一个哈贝马斯式的概念。

霍尔: 哦,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它来自何处!我对“全球市民社会”感到怀疑。你知道,我确实读过一些当代理论,我读过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真正全球性的是“赤裸生命” (bare life)。很多人未受到法律保护,没有人道主义关怀,得不到分配制度的照应,没有个人生活,真是悲剧!我认为,“全球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太过于乌托邦了,太过于乐观了,也太过于以西方为中心了!

参考文献

- Adorno, T. W.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Althusser, L. et al. (1965)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1897],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Durkheim, E. (1964)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1895],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Hall, S. and Whannel, P. (1964)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Hutchinson Educational.
- Hall, S. and Jefferson, T. (eds.)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arper & Collins.
- Hall, S. et al.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 Macmillan.

Hardt , M. and Negri , T. (2000) *Empire*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bdige ,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 London , Routledge.

McGuigan , J. (1992) *Cultural Populism* , London , Routledge.

Mills , C. W. (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s , C. W. (1956) *The Power Elite*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rtre , J. - P. (1963) *Search for a Method* [1957] ,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Weber , M. (1930)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 - 1905] , New York , Scribner.

Winter , R. (2001) *Die Kunst des Eigensinns. Cultural Studies als Kritik der Macht* , Weilerswist , Velbrück Wissenschaft.